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D
U
A
N
L
I
E

H
A
I
S

I
C
H
U
A
N
C
H
E
N
G

断裂还是传承?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资本主义观

韩秋红 李百玲◆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华夏英才基金学术文库

断裂还是传承？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资本主义观

韩秋红 李百玲◆著

D U A N L I E H A I S H I
C H U A N C H E N G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MA194/p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裂还是传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资本主义观/韩秋红、李百玲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5

ISBN 7-80109-859-5

I. 断…

II. ①韩… ②李…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B089.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204939 号

断裂还是传承——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资本主义观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 66560272(编辑部) 66560273 66560299(发行部)

h t t p : //www. cctp. com. cn

E - mail : edit@ cctpbook. 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0. 75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 80 元

前 言

在当今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常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本是很简单的问题，却会令大家瞠目结舌。原因在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多半局限于我们日常的、现行的正统理论，或某国、某时期的既定学说，或者就是马恩列等领袖人物所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当然离不开这些方面，但仅局限于这些方面，势必使理论研究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势必使青年人眼光短浅地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一国一地一时的得与失，势必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广泛的内容和丰富的理论演进。因此，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我们应当从三个层面上把握。其一，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即包括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其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包括马克思之后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对现实的理论概括之总和；其三，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开放的，不仅有西方风格的思想家，而且有东方思想风格和文化传统的思想家，不仅有流行的那些内容，而且还有尚待发现或恢复的一些内容。这样就可以避免两种倾向：妄自尊大，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正宗，而忽视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悲观失望，囿于一时一地马克思主义

发展的不景气，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产生消极情绪，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从形成过程看马克思主义

凡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产生阶段、发展阶段、分化阶段和渗透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阶段，主要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 1820—1895)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参加了革命的实践，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才有可能使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构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图景，提出了一些带有理论构造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当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运动的代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是对无产阶级的认识，都几乎是在哲学、经济理论水平上的认识，而对推动实践的具体策略着力不够。加之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约有四分之三是生前没有发表的，如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剩余价值理论》(1862—1863年)、《资本论》(第二、三卷)、《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论瓦格纳笔记》(1880年)。这些哲学、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在理论家们之间进行传阅和保留。特别是马克思的这些著作侧重于经济分析，对国家机构及

其功能的政治分析，以及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分析，再进而对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战术所作的政治和文化分析，就相对薄弱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产生阶段并不是着眼于具体问题、策略、方式，而是着力于整体构想、哲学方法、经济基础的分析上。

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它的大发展阶段。这是以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Antonio Labriola, 1843—1904)、弗兰茨·梅林 (F. Mehring, 1846—1919)、卡尔·考茨基 (Karl Kautsky, 1854—1933)、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Georg Plekhanov, 1856—1918) 为代表的宣传、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那些理论构想的阶段。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忽略这一重要环节。这使得人们感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 思想的出现，无论在思想气质，还是在文章风格上，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较大差别。上述四个人和恩格斯都有通信往来，他们或多或少地直接继承了恩格斯解释、保卫的马克思学说，并开始使马克思学说形成系统化、条理化的传统。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称之为侧重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理论演进传统，它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让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即思想武器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相对的一门“科学学说”。因此，他们都侧重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四个人所著论文几乎是同一主题：梅林著有《论历史唯物主义》，拉布里奥拉著有《唯物史观论文集》，普列汉诺夫著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考茨基著有《唯物史观》。在这里说他们处于发展阶段，并不是说他们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重大发展，而是说他们的著述更多是从理论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使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得到了一个新的“视野”。特别是这些人还整理和恢复了马克思的手稿，撰写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使马克思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家长存于世。从这些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本人未曾展开的一些观点，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过渡到 20 世纪所曾经历的思想演化过程。

二、从实践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所曾经历的真正发展，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往往把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解为列宁一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不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人的。这种看法实际上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形，而且也淡化了列宁本人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力度。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列宁、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 1871—1919)、列夫·托洛茨基 (Trotsky Leon, 1879—1940)、鲍威尔·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 1888—1938)、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他们的特点在于：注意实际的经济的发展，因而注重社会变革的具体方式、策略、战术、措施。这些人在各自的国度里，都是著名的党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几乎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即产生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前景，而且他们还遇到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在当时遭到一些人批评的局面，因此，觉得有必要对之作出新的解释和发展。考茨基就注意到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变革问题而写作《土地问题》；列宁更是大胆、新颖地结合俄国实际寻找革命

道路，把《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一般的生产方式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具体研究俄国的农村问题，著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对《资本论》中思想的运用，已不局限于具体“部门”或“国家”，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考察了托拉斯、关税、贸易战争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发生的新变化，看到了银行的作用、垄断的加速、资本主义国内的国家机器的控制与国外的扩张资本的竞争之间的一些新现象；鲍威尔的《少数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未触及的问题，即在现实的多民族国家中的革命问题；卢森堡和布哈林的著作则阐述了国际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列宁正是对这些问题作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研究与总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提出了“一国胜利”的理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产生阶段主要是提出了关于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构想。从理论构想到社会现实，要经历科学模型、操作手段等一些具体的环节。如果说希法亭、鲍威尔、布哈林、考茨基等人对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分析属于科学模型的话，那么由列宁制定的具体政治斗争策略、方式、措施，则是在把构想转变为现实这一过程中的操作手段。正基于此，我们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大发展。

与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革命导师和理论构想者相比，列宁更是一个政治宣传家、鼓动家和革命斗士。他的思想特色主要不仅在于理论的严密与深奥，而在于其鼓动力与感染力，更在于其在组织上和策略上把马克思主义的阶段斗争，其中包括党纲、党纪、宣传、鼓动、罢工、示威、建立阶级联盟、巩固党的团结、处理民族问题、阐述国内外危机、应付各种偏见、怎

样利用议会、如何准备起义和暴动等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考虑过的具体措施系统化。列宁所研究的革命战略政策和具体措施，并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认为的简单无用的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财富。列宁主义的成功，不仅在于理论著述上，而且在于促使俄国专制制度的垮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列宁主义是靠实践和事实让人信服的。

列宁主义开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由理论构想走向现实存在的新时代，功不可没。列宁主义出现以后，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现象。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两个相当尖锐的问题：(1)马克思主义在不同于俄国这样落后国度的发达国家里，如何发展？(2)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度中，又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健康地发展？这里存在着两个步骤，即从名转化为实的第一步——夺取政权，再名副其实——走向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步。前一步，许多落后国家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及世界进程的时机，都通过努力而达到了；但第二步，在今天看来，则是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重大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落户的那些国度的具体情况不同，加之发达国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景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从总体上看，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大分化、大讨论，实质上是大发展、大实践的图景。这种讨论与实践，大体沿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走的道路，卢森堡、卢卡奇在这个发展路途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一是不发达国家应当走的道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是典型代表，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往我们对这一时期及其特征研究不够，把几乎所有有悖于列宁主义路线的思想观点统统斥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当

然有这样的学说),无疑是封闭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视野,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我们在重新认识世界时,一看到不同于列宁及苏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就斥之为异端邪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人的逆反心理:即在另一极端上,把我们鄙弃的异端邪说当作“真理”,而把我们尊崇的学说统统斥为“教条”。

所以,当我们的视野进一步打开时,我们发现,卢森堡的早逝,使她在监狱中深深忧虑的有关内战时期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那些国家将要遇到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展开;同样,列宁的过早逝世,也使他在晚年及病中冷静思索的苏维埃——工农联盟等重大的政权建设问题没有得到展开和实行。战争动乱中的革命家的政治魅力,在夺取政权时无疑是最大的优点和最令人敬佩和跟从的品行。但革命胜利后,怎样使之从个人的力量转向制度的合理力量,却是社会主义苏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所遇到的重大问题。这使我们今天谈到列宁晚年的著述,读起卢森堡关于民主的论述时,总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有非常远大的前景,也会经历艰难的路程。列宁逝世后,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也遇上了一些情况:在国际上,193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重大历史转折到来时,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反而以法西斯上台为结局;在苏联国内,肃反扩大化和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带来了不少消极后果,以致今天一些人仍在纠缠历史老账。为什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获得真正的发展?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两代人一直思考的问题:一是西方知识分子探索一条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些令人思考的理论;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获得新的生机！前者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版本。

20 世纪初，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践运动中的列宁主义时代的开始。与此同时，西方其他几个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却遭到了挫折，从而促使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新的探索。1923 年，匈牙利党的活动家和理论家捷尔吉·卢卡奇 (George Lukacs, 1885—1971) 将其从 1919 年至 1922 年以来发表的有关“正统马克思主义”、“物化”、“阶级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职能变化”等 8 篇文章整理发表，在重新探讨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辩证法理论进行了新的解读，并据此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等哲学错误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批判。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和理论家卡尔·科尔施 (Karl Korsch, 1886—1961) 也于 1919 年发表了《什么是社会化？》一书，对于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科尔施认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根本不是一回事。与国家化相比，工业自治才是真正的社会化。在工业自治中，社会生产关系得到调节和改善，“官僚主义的公式化和僵化一扫而光，个人积极性不但没有被窒息，反而还尽可能地得到提高”。科尔施把这个过程称为“从公有经济的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①科尔施 1923 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则更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大哲学问题入

① 科尔施：《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09—110 页。

手，进一步强调了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他甚至对列宁的一些哲学思想提出了质疑。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葛兰西在 1926 年至 1936 年期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监狱生活，这期间他写了 4000 页的狱中笔记，从多方面总结和思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以及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意义问题等，都作出了非常天才的阐述。

当然，这些早年的马克思主义另类理论解读当时并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卢卡奇和科尔施两人都曾受到过开除党籍的不公正对待，葛兰西的思想也是在十年以后才进一步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但是，进入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由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也由于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新发现和公开出版，人们惊喜地发现了马克思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注重人，注重人的解放，注重人的自由发展，注重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地位和意义，等等。这些重要思想的重新发现不仅引起了人们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而且也让人们重新发现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理论预见性及其理论工作的价值。所不同的是，20 世纪 40—50 年代以后的研究者们充分利用了先后兴起的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分析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并用这些哲学方法从不同的侧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

马克思主义流派。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看，这些研究的正确与否实际上已经变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尝试本身。它至少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并没有沉寂，而是深深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化和学术研究之中，形成了我们与西方学者讨论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共同的话语背景。随着传统思维的终结和全球化时代的真正开始，随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会看到，这种共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背景的重要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用发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

我们多年来一直有一种看法，以为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后，就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了。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只不过具有与十月革命道路和东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特点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与其说是地域性的概念划分，毋宁说是以其思想性、政治性来界定的。一般的西方学者都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失败”或悲观的产物。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1938—)在所写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他流亡于维也纳时写作的，那时匈牙利公社遇到镇压，匈牙利陷入白色恐怖；葛兰西的《狱中札

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镇压了意大利的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的《最低道路》是在德国正式取缔共产党那一年完成的；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19)的《爱欲与文明》是在麦卡锡主义嚣张至极的年月问世的；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 1905—1980)的《辩证理性批判》，是在法共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面前麻木不仁、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写成的。与此同时，已经取得政权的苏共内部则在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或是由于党内强调服从的压制而未展开，或是由于被排除在党外，处于旁观和孤独的位置，而与实际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属于后者，即与实际相脱离的理论发展。这也就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特征：由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经济和政治的关注，转向了对哲学和文化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中，专业哲学家占了压倒多数。与卢森堡、考茨基、列宁等从未正式在大学中任职或教学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卢卡奇、科尔施、赫勒·列菲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马尔库塞、阿多诺、科莱蒂尔(Lucio Colletti, 1924—)、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等都在大学拥有教职，而且专业无一例外，都是哲学。

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由政治、经济转向哲学，除当时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悲观因素之外，还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哲学传统，即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都贯穿着的一种传统。《手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他们或是从《手稿》回到格奥尔格·威

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的古典哲学中,或是从《手稿》出发,憧憬未来社会图景或批判现存社会。他们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理论反思。他们从实践的失败看到马克思理论本身的价值,以及实践与这些理论的脱节、距离。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上的无能者,但却经历着精神上的“奥德塞”漫游。他们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几十年发展后,重新又回到了由实践向理论的回溯。但这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那一代人是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本原理,走向经济、政治;也同成熟的马克思由哲学到经济、政治相反,反而同青年马克思一样追寻哲学本身。换言之,是追寻一种总体的观察、认识的方法。所以,他们对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黑格尔和《手稿》推崇备至。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专门指的是方法。正是由于哲学方法上的考虑,他们的文字晦涩、艰深、古奥。这样,这种属于专业哲学家而不是革命家的东西,当然也就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相脱离了。这样,它的短处在于理论同实践相脱离,它的长处也在于理论同实践相脱离。由于理论不再听命或盲从实际斗争的发展,不再是现实的注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较为注意当代世界理论本身的发展。他们同当代哲学自身问题发生关系,同当代一些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展开讨论、辩论和交流。与马克思当年同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一样,他们也卷入到当代许多问题的争论之中。在这种横向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整个人类文化又发生了交往、对上了话。这对20世纪的文化发展无疑推动甚大,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同当代各种思潮、

方法、观念的搏击中，得以辨别、选择和发展。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的第十一条：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为这句话并不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改造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必须不断地反省、解释这种改造本身。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设计、研究、分析各种各样操作的、改造世界的中间环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生态学和美学……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移，即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基础的注重，转移到对上层建筑，尤其是对政治、文化领域的注重。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限制的分析，还是对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分析，都集中在这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艺术、美学、文化的分析，又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在于心理、意识、文化层面上的解放。经济问题、国家问题让位给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异化与复归这些抽象的哲学问题。换言之，解放本身，由经济学上的量的解放，变为心理体验上对幸福感受的质的解放。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思想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马克思当时所料不及的新情况，由于在物质——制度层面上的发动革命困难重重，而产生了悲观、逃避的情绪。葛兰西本人称之为“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这也恰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安德森说得更精彩，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经历了一次大分化，东方马克思主义在现

实上的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分化；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与实践的脱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由革命、经济—社会变革的纲领，变为哲学—文化的学说。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它至少为建立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世界性话语模式，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话语背景。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只是中国的，她首先是西方的，更应该是世界的，因为她本来就是世界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具有世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中国，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沟通和对话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东西方学者应该走在同一个理论研究的起跑线上。

苏东剧变以来，西方左翼因为缺乏新的理论而陷入了一片混乱。这种理论的贫乏和思想的混乱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对中国改革的不理解，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出现了目标缺失，对社会主义研究重新出现了乌托邦化趋势，等等。这一切都说明与中国的少数左派不能理解中国的 20 年改革一样，西方的左翼也曾一度对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产生过怀疑，许多人都曾一度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尤其不能原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化，认为这是严重的历史倒退。但是，20 年后的今天，西方左翼普遍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改革现实，并结合中国的改革现实重新思考社会主义问题。

这就是说，历史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推到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中来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在总体上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走出列宁主义阶段，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跨越。要做到这一